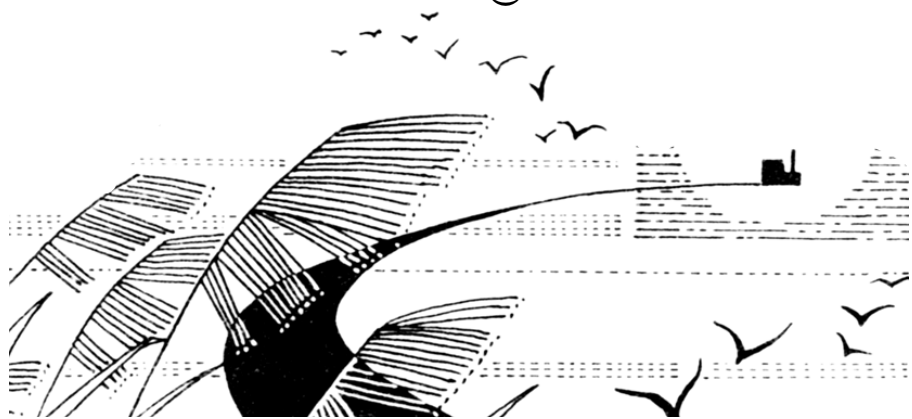


中国语言文字论丛  
(十二)

马敏 主编



# 目录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	1
汉字和汉语 .....	3
口语和书面语 .....	15
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 .....	22
语言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语言的发展 .....	24
语言发展的特点 .....	27
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 .....	30
社会方言 .....	31
地域方言 .....	35
亲属语言和语言的谱系分类 .....	39
语言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 .....	43
共同语 .....	46
共同语的规范 .....	49
借词 .....	51
结构规则的借用 .....	56
语言系统的排挤和替代 .....	58
何以知道语音的发展 .....	77
语音演变的规律性 .....	82
语音对应关系和历史比较法 .....	85
组合规则的发展 .....	88
聚合规则的发展 .....	92
语法发展中的类推作用 .....	95
语法发展中的类推作用 .....	99
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亡 .....	102
词语的替换 .....	105
词义的演变 .....	108

语言文字类法规 .....	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	114
第一章总则 .....	115
第二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	116
第三章管理和监督 .....	118
第四章附则 .....	120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 .....	120
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 .....	122
已制定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明细表 .....	127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34

##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说明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也说明了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言之记”。语言中的语素、词这些单位包括音和义两个方面，记录语言的文字，除了音、义之外，还必须有自己的形体。所以，文字有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字音、字义和语素、词等单位的音、义一致，而字形则是文字所特有的。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形”，每一个字必须能读出音来，这是文字的本质，这样才能用文字的“形”来记录语言中的语素、词等单位。拼音文字一般都是用一个字去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词，比方英文的 book，“book”是形，[buk]是音，“书”是义。绝大部分汉字代表汉语里的语素，也都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少数汉字只有字形和字音，而没有字义，如“蜘”“蝴”“玻”“琉”等，它们要和别的字结合起来（如“蜘蛛”“蝴蝶”“玻璃”“琉璃”等）才有意义。

语言是一种系统，文字也是一种系统，它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例如汉字包括笔画、笔顺、偏旁、标点等，英文等拼音文字包括字母、字母顺序、拼写规则（大写字母用法、移行规则、自左而右的书写顺序）标点等。通过这样的书写符号的系统可以把语言符号记录下来，使语言的口头形式书面化。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所以每一种文字都必须适应自

己所记录的的语言的结构特点和语音特点。汉字所以长期停留在方块字的阶段，这与汉语的特点有一定关系。在古代，汉语的语词以单音节占优势，没有形态变化，缺乏词缀等附加语素。语言的这些特点有利于保持一词一形的书写体系。如果汉语也像俄语那样是有词形变化的语言，那么古人就可能会选择另一种文字体系，以便把词尾变化表示出来。这从日语和汉字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日语是粘着语，有词形变化，也多词缀等附加语素，因此日本人民除借用汉字外还创造出假名来补充书写日语的附加语素和词尾变化。


语言要求文字正确地记录它。语言的特点制约着文字的特点。但是文字和语言毕竟不是一回事情，用什么形体去记录语言，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同的语言可以采用相同的文字形式（如英、法、德、西班牙等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而同一语言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文字形式，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文有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两种拼写法，朝、越等国家原来采用汉字，后来经过文字改革，实现了拼音化。不管文字的形体如何变化，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种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语言没有阶级性，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也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没有阶级性。可是语言人人都会，文字需要专门的学习，不是人人都掌握的。在旧社会，广大劳动群众成天为生活而操劳，没有条件读书识字、掌握文化，识字有文化的人大多是经济条件优越的剥削阶级的成员。这种情况产生一种假象，好像文字是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有阶级性。特别像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要掌握它很困难，更容易引起这种误解，仿佛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

众的工具。汉字的确难学、难写、难认、难记，这给劳动人民学习文字、掌握文化增加了困难，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有阶级性，因为汉字也是劳动群众反对剥削、进行革命的工具。用汉字写成的各种文章、文件起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巨大作用。毛泽东、鲁迅犀利的、富有战斗性的文章都是用汉字来书写的。所以，文字就其性质来说，和语言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不是哪一个阶级、阶层的专利品。

## 汉字和汉语

文字以自己的“形”通过“音”去表达“义”，这种关系在采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中不会引起疑问，但是在我国，却由于方块汉字的构造特点而有好些复杂的情况。

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一个字的拼写反映出语言中一个符号的语音面貌，人们基本上按照字母的拼法就能读出音来。方块汉字与此不同，往往能见“形”而知“义”。例如“日”，原来的书写形式，形状像太阳；“田”的形状像地块，“休”是“人”靠在树（木）上休息；“水”“火”“木”“女”等偏旁表示字的意思跟“水”“火”等有关系，好像字形本身就能跟意思直接挂钩，不需要通过语音的环节。所以有人说：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而不是语言的复制品。这种看法是受了汉字形体的束缚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好些汉字的形体确实有提示意义的作用，但是汉字和其他拼音的文字一样，同样和语言里的词相联系，它必须能读，通过读音确定自己所表示的是语言里的哪个词，这样才

谈得到字义的问题。例如“日”尽管提示太阳的形象，但它并不记录汉语里的“太阳”“日头”“老爷儿”这些词，它同样也是通过“ri”的读音和意义发生关系，记录汉语中“日”这个语素。至于写的时候或者看的时候读不读出音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文字的本质无关：即使不读出音来，它也与心理的语音映象联系着，不是说与语音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教儿童识字，或者我们学习外语，首先是学字的读音，通过语言的音学会文字。

拼音文字是人们按照字母的拼写阅读，所以写与读的距离不会太远，语音变了，拼写法也得跟着变。例如古代的拉丁语发展到现代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语言，记录拉丁语的拉丁文的拼写法也随之改变。要学习古典拉丁语，只知道现代法语或意大利语的拼写法是没有用处的，必须像学习另一种文字体系一样，从头学习古典拉丁语的拼写法，按照这种拼写法读出语词的音。这个音是古语的音，表达什么意思，不一定知道。汉字的情况与此不同，字形不限于和一种读音挂钩，读音尽管变了，字形可以不变。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语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方块汉字没有变（一个字从篆书到隶书、到楷书，是书写形体本身的变化，还是同一个字）。所以同一个汉字，各地的人都认识，但读音可以很不一样：广东人用广东话读，上海人用上海话读，北京人用北京话读，相互之间听不懂；而且用这些不同的方音还能去读古书，用不着像看拼音文字写的古书那样，得先学古音。把这些情况概括起来，就是念出来听得懂听不懂无关大体，只要写出来看得懂就可以了。几千年来，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大体上保持着这样一种状

况。这使人们形成一种错觉，好像汉字是“看”的，不是读的，和语音没有联系。其实不然，汉字不仅是“看”的，而且也是“读”的，只不过它可以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音来读罢了。这是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不同于拼音文字和其所拼写的语言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上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文字和语言等同起来，以为语言与文字是一回事。过去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汉字简化了，改革了，叫我们怎么讲话？其实这是误会。文字改革不等于语言改革。改进或改革文字的目的，恰恰是要使文字能更好地记录语言，而不是要改变语言。

文字还可以借用，借用文字不等于借用语言。现在日本在文字中夹用汉字，并不是讲日语要夹用汉语。

了解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对我们搞语言学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 一、文字的起源

用文字记录语言，实际上就是设计一套形体去书写语言的符号。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并不复杂，可是人类为了创造文字曾经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关于文字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在我国，相传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的。文字从无到有的创造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决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荀卿就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意思是：古代创造文字的人很多，因为仓颉专门整理过古代的文字，所以惟独他的名字传了下来。荀子的话是对的，但是他只说明了仓颉和汉字的关系，没有涉及文字的起源。事实上，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

道路。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根据考古的新发现，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文字。在古代，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人们（特别是氏族或部落的领袖和长老们）需要记载本氏族或本部落的人口、财产、对外战争的情况，以及内部发生的大事等等，以帮助记忆。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找到了记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实物记事，一种是用图画记事。

比较普遍的实物记事的办法是结绳。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就曾使用过这种方法。《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的办法已不得而知，后人只说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秘鲁人、琉球人、我国台湾的少数民族也都采用过这种方法。讯木也是一种记事的方法。这是在一根木棒上刻上各种花纹或插进各种东西，用来帮助记忆和传达命令。据《北史·魏本纪》记载，魏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唐会要·吐蕃》记载吐蕃（今藏族）“无文字，刻木结绳以为约。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五代会要》也记载“契丹本无文记，惟刻木为信”。可见信木等在一个民族的文字发明以前，也和结绳一样，起过记事、传令等重要的交际作用。

实物记事的方式很多，现在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还保留着这种做法。我国境内的瑶族曾经用禾秆记录一年的收成，用木板刻点和玉米来记工分。云南陇川县的景颇族有一种以实物代替信息的习惯。假如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他就用树叶包上树根、大蒜、火柴梗、辣椒，再用线精巧地包扎好送给女方。树根表示想念，大蒜表示要姑娘考虑两人的事，辣椒代表炽烈的爱，火柴梗表

示男方态度坚决，叶子代表有好多话要说。女方收到以后，如果同意，即将原物退回。如果不同意，便在原物上附加火炭，表示反感。如果还要考虑，便加上奶浆菜。这些都是今天还在使用的实物记事、传递信息的具体例子。


图画在古时候也是用来记事的一种重要方法。用图画记事、交流思想，可以用印第安人奥基布娃(Ojibwa)部落的一个女子的情上面就是这个女子在赤杨树的树皮上写给自己情人的信。左上角的“熊”是女子的图腾，左下角的泥鳅是男子的图腾，曲线表示应走的道路，帐篷表示聚会的地方。帐篷里画一个人，表示她在那里等候。旁边的三个“十”字，表示周围住的是天主教徒。帐篷后面画大小三个湖沼，指示帐篷的位置。这种图画把事情作为一个整体来描绘，是否看得懂，取决于看画的人和画画的人生活经历上的联系或其他条件，跟他们是不是说同一种语言没有关系。换一个人去看这种情书，只能望图兴叹，不知所云。

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都是帮助人们记忆的一种办法，但是实物记事与文字的产生没有什么关系，而记事的图画却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图形简化，一个图形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语素或词，那就产生了真正的文字。文字起源于图画，所以有人把记事的图画叫做“图画文字”。

## 二、文字的发展

文字的发展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一是文字记录语言的完备程度，一是造字的方法。早期的文字是原始文字，它不能全面地完整地记录语言。原始文字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变成能够全面地、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从造字的方法考察，文字的发展经

历了表意——表意兼表音——表音三个阶段。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今天的文字是怎么演变来的。

每一种独立形成的文字都脱胎于记事的图画。由记事图画简化或拆散而成的表示单个事物的图形，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定型，所表示的意思也随着使用场合的不同而有变异。这种处于原始状态的文字还带着脱胎而来的记事图画的母斑，没有和语词完全挂钩。例如我国云南纳西文的“九”通常写作，而在丽江纳西族的经典《古事记》里，当说到“九对蛋”的时候，就把小点改成小圆圈儿，写成，既表示“九”的意思，又表示“蛋”的意思。又如“吼”字通常写成右图的样子，像牛出声气，如果把牛头换作马头，就可以用来代表马嘶。用原始文字书写的句子，语言里必不可少的成分可能被省略，字的排列顺序也不确定，和语言里词的次序不完全一致。这种现象在纳西文里比较普遍。即使是已经形成为文字体系的甲骨文也还保留着这方面的一些痕迹。例如有一条卜辞写着：“甲申卜御妇鼠妣己二”。那次占卜是问：是否可以用“二”作为牺牲来祭祀妣己，以拔除妇鼠的灾祸。“二”显然是“牝”（母牛）“牡”（公牛）两字的合文，或指“二牝二牡”，或指“二牛，一牝一牡”。无论哪一个意思，语言里的有些成分没有写出来。如果直接以“二”代替“一牝一牡”，那与语言里的词和次序就有很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文字和语言没有一一对应。

原始文字的形体没有完全定型，字形和语词的对应关系也没有完全固定，而且好些语词还没有造出字来表示。这样的文字工具当然只能粗略地记录语句。这种文字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才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独立的文字体系。和原始文字比较，独立的文字体系必须

具备如下的条件：第一，把整幅的画简化或拆散成单个的图形，一个图形跟语言里的一个语素或词相当。第二，这种图形可以重复使用而所表达的意义不变。第三，把这些图形作线性的排列，依照它们的顺序念出来，也就是语言里的词的顺序，顺序不同，意思也就不同。从原始文字进化到文字体系，用借音的办法扩大文字所能记录的语词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例如汉语里“旗”和“骑”同音，人们就可以把表示旗子的字形借用来表示骑马的骑。这样，如果先画一个人，再画一面旗，再画一匹马，这是“人骑马”；如果先画旗和马，再画人，那就是“骑马人”。文字发展到这种程度，才能完整地、全面地记录一种语言，使原始的文字发展为独立的文字体系。汉字大概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形成为能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

从造字的方法看，由最早记事的画图发展成今天许多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中间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由记事图画发展出来的是象形的表意字。例如：有些抽象的意思无法用简化的图形来表示，就用转弯抹角的“会意”的办法，例如画一个人靠在树上表示“休（息）”等等。

表意字虽然可以从形体知道它所表示的意思，但实际上它已与语素、词等单位的声音挂上钩。字形与语词的声音挂钩，因而可以念出来，这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步。人们认识到字形和语音之间的联系之后，就直接借用一个同音的表意字来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者在一个表意字的旁边加注读音，因而出现了意音文字。世界上独立形成的古老的文字体系都是意音文字，即兼用表意、表音两种方法的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

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和我国的汉字都是这种类型的文字。各种意音文字体系都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字形：表意字，借表意字充当表音字，以及兼用表意表音两种方法的字。我国传统的文字学把第二种称为假借字，第三种称为形声字。

表意字是古代意音文字的基础。但是靠表意字来记录语言有很多困难：有些现象很难表意（例如“成”“长”之类），造不出字来；而且如果事事表意，那就得一事一个字，造不胜造，给记忆造成极大的负担。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人们想出了借字表音的办法，于是出现了假借字。例如代词“其”无法造表意字，于是借用“簸箕”的“箕”（原写为像箕形的）。语气词“唯”借用像鸟形的“佳”。其他如“分离”的“离”、“困难”的“难”也都是假借字。它们原来都是鸟名，例如“离”是“黄仓庚也，鸣则蚕生”，“难”是“鸟也”（均见《说文》）。假借字的大量出现，说明人们已逐步意识到文字不一定要画出事物的形象，也可以直接表示语词的音。这是文字的一种早期的表音方法，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进展。

假借方法的运用使一个字可以代表几个同音的或音近的词。为了避免混淆，人们就在同音字的旁边加上表示意义类别的标志，即通常所说的“形旁”或“意符”。另一方面，为了识别表意字，也可以在它旁边加注跟它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即一般所说的“声旁”或“声符”。这样，把表意和表音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产生了形声字。像“情”，“忄”代表“心”的意思，是意符或形旁，“青”代表“情”的读音，是声符或声旁。上面所说的“其”原来指簸箕，后来借用为代词。代词“其”的

使用场合远远超过簸箕的“其”，喧宾夺主，“其”反而成了表示代词的“正字”。为了和原来的意思区别开，给“其”字加上意符（竹字头）表示簸箕。“箕”是后起的形声字。汉字是现行文字中的一种典型的意音文字。

表意字也好，表音字也好，记录的都是语言中的语素或词。我们知道，一种语言的语素有好几千，词的数目就更大了，要为每一个语素或每一个词创造一个书写形体，势必字数多，繁杂而不经济，使用起来不方便。汉字的难学、难写、难认、难记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要简化文字符号，必须走表音的道路。语言中的音位是有限的，一般只有几十个；音位组合起来的音节，为数也有一定的限制。如果能用适当的形体记录语言中的音，就可以大大简化文字体系。记录语言中的音节就是音节文字，记录语言中的音位就是音位文字。使用音节文字的，一般都是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音节数量不多的语言。日本的假名就是一种音节文字。如果一种语言的音节结构比较复杂，使用音节文字也并不简便，这就需要进一步向记录音位的字母文字发展。表示音位的文字，只需要几十个字母就可以拼写语言中的全部音节，进而书写全部的词和句子。音位文字是文字体系中最简明、最方便的文字。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造字的方法不外表意和表音两种。造表意字的主要方法是象形；造表音字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假借，二是创造专门的表音字，而这专门的表音字又分表音节和表音位两类。意音文字则是同时兼采表意、表音两种方法。从表意到表音位是文字造字方法发展的总趋向。汉字由于种种原因始终维持着意音文字的格局。它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即每一个

汉字基本上记录语言中的一个单音节语素；少数语素不止一个音节，只能用几个字表示，但每个字记录一个音节，如“玻”“璃”“衍”“徨”等。

### 三、文字的改进和改革

文字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记录语言的书写工具。语言的特点制约着文字的特点。按照这种关系，语言变了，文字的写法似乎也应该跟着改变。但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支配文字发展的条件与语言发展的条件不完全相同，书写的工具和材料（如用笔写和用刀刻不同），方言的分歧，社会的分化和统一，文化历史传统的强大力量，等等，都可以影响文字的发展。所以跟语言相比，文字有很大的保守性，语言社会一旦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它就不会轻易起变化。语言变了，文字的写法可以不变，这样就形成文字的书写形式和语言的实际发音的矛盾。英语的“light”，“right”，“sight”，实际发音是[laɪt][raɪt][saɪt]，其中的“-gh-”不发音，书写时为什么还保留它们？这是因为英语的拼写法代表15世纪的英语发音，那时“gh”发舌根擦音，这个音现在在英语中已经消失，但还保留在低地苏格兰语中。由于文字的拼写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的语音，造成学习、使用的困难，因而不时有人发出改革拼写法的呼声。英国的名作家萧伯纳在临死时留下遗嘱，把他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奖金，奖给英语拼写法的最好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并且用这种方案的拼法来刊印他的一本没有发表过的作品。有人为此进行过尝试，可是没法推广。因为拼写法改变以后，阅读过去的书面材料就有困难。而且语言是经常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今天的拼写法符合实际的发音，过不了几十年，语言和文字又会发生分歧。

书写英语的是拼音文字，英语的拼写法和发音的矛盾是在两者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上述改革的呼声实际上是要求局部改进拼写的方法，属于文字的改进。至于表意文字或意音文字改为拼音文字，那是文字体系的改革。

汉字是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相比，它难学、难写、难认、难记。汉字所以长期停留在意音文字阶段，除了前面说过的语言特点的制约以外，还有别的原因。汉族的居住地区幅员辽阔，方言分歧，有的不能通话；汉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大量用汉字记载的文献典籍。超地域、超时代的汉字既可以贯通古今，也可以联系各地区的人们的思想交流，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便利各地区人民的往来起着重要作用。在语言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如果汉字也像其他文字那样实行拼音化，就会严重妨碍各地区人民的交往，而且也会和过去的文化遗产割断联系。这些因素都是汉字长期停留在意音文字阶段的重要原因。

汉民族用汉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文字也逐渐暴露出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方面。它在学习、书写、排版、通信、情报检索、文字信息的储存和处理等方面都远远不如拼音文字方便。我国从19世纪末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文字改革的呼声，要求实现拼音化。文字改革的先驱者卢懋章在1892年就指出，汉字实行拼音化之后，“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五四”运动前后还出现过“注音字母”、“国

语罗马字”作为汉字的标音工具，推行过拉丁化新文字。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文字改革，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拼音方案的设计经过专家的长期研究和反复讨论，既能准确地反映普通话的音位系统，又跟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字母一致，比以前的所有方案都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它已经在汉字注音、识字教育、型号标写、资料检索、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等方面得到应用，我国的人名、地名在国际上也以拼音方案的写法作为标准。这证明它是一套合理、简便的标音工具，应该积极推广并研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但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而只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必须把它和汉字体系的改革区别开来。

汉字体系能不能改革，实现拼音化？现在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至少在目前来说，我们还看不到需要对汉字体系进行根本的拼音化改革的需要。前面说过，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工具，必须适应语言的结构特点。汉语的语素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汉字的语素-音节文字体系基本上符合汉语的结构特点，因而几千年来一直沿用下来而没有进行性质上的改革。汉语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数量有限，而语素的数量要比音节多好多倍，因而语言中的同音语素特别多。例如 d n 这个音节所表达的语素就有 13 个之多（据《现代汉语词典》），一旦实现拼音化，这些原来用字形来区别的不同语素就无法识别，势必会给语言文字的使用带来麻烦和混乱。有些单音语素虽已不单独使用，而与其他语素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复合词，这自然可以减少一些同音语素所带来的麻烦，但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哪些是词，应该连写；哪些是词组，